

现代汉语词汇学丛书



词汇研究

刘叔新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现代汉语词汇学丛书

- ◎ 总结归纳，梳理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的历史脉络
- ◎ 条分缕析，探讨现代汉语词汇、语义、词典编纂等层面的理论问题
- ◎ 推陈出新，反映当代词汇学研究最新成果
- ◎ 指点后学，昭示汉语词汇学治学门径

责任编辑：吴凤珍

封面设计：袁 璐

ISBN 7-5600-5863-9



9 787560 058634 >



一个学术性教育性
出版机构

网址：<http://www.fltrp.com>

ISBN 7-5600-5863-9

定价：19.00 元

现代汉语词汇学丛书

词汇研究

刘叔新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汇研究 / 刘叔新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7
(现代汉语词汇学丛书)
ISBN 7-5600-5863-9

I. 词… II. 刘… III. 汉语—词汇—研究 IV.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6856 号

出 版 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吴凤珍

封面设计: 袁 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37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5863-9

定 价: 19.0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出版说明

“现代汉语词汇学丛书”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同厦门大学中文系苏新春教授、鲁东大学（前身是烟台师范学院）文学院张志毅教授共同拟定的。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对建国以来的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作一个历史总结。现代汉语词汇学的研究自孙常叙先生的《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和周祖谟先生的《汉语词汇讲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开其风气，兹后几代学人先后承接，出版、发表的论著、论文蔚为大观，数量之多，几乎使人目不暇接。由于种种原因，有些著作后来未能再版，或虽再版但早已售罄，今天的学子如欲一观，实属不易。我们以丛书形式将这些著作重新出版，既是对前贤学术成就的一种纪念，也是给后学指示治学之门径。

收入丛书的十种著作都是经与有关学者反复商议而定的，大体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学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但也有遗憾，由于丛书规模的限制，有些原本很优秀的著作未能收入，或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未能拿到出版权，最后只好忍痛割爱。这是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由于这套丛书的编选宗旨主要是反映已然的历史成果，所以我们对原书采取的处理原则是尽量保持原有面貌，编辑的改动仅限于个别文辞的调整。像周祖谟先生的《汉语词汇讲话》从报纸连载到现在差不多快五十年了，书中所举的许多语言材料尽管在当时是最新词语，但半个世纪过去了，词汇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出现同当时作者的“预见”截然相反的情况。书中的个别观点和语言表述在今天看来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其他一些著作也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认为这很正常，因为这些著作“史”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论”的价值，大可不必强改故书以就

今论，希望读者理解。

第三，这套丛书还收入了几部未曾出版过的新著，目的是在作历史总结的同时也能反映当今词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汉语词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从表层的描写转为深层的解释，从词的结构分析转为语言理据的探求，从单个的语义分析转为对汉语语义系统整体结构的认识，从平面的语言研究转为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的立体考察。这些转变标志着传统词汇学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全面革新。另外，我们还想借最新入选的论著向读者表明，本丛书是一个开放的系列，还会有更多的词汇学新著走入这个系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年7月

丛 书 序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汉语部经过一段筹划，终于隆重推出“现代汉语词汇学丛书”，第一批出十本。序齿列锦：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语文学习》1955—1957；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刘叔新《词汇研究》（新选论文集）。

符淮青《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语文出版社，1996）。

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与词典编纂》（新选论文集）。

周光庆《从认知到哲学：汉语词汇研究新思考》（新著）。

张绍麒《汉语结构词汇学》（新著）。

苏新春《汉语词义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

周荐、杨世铁《汉语词汇研究百年史》（《汉语词汇研究史纲》，语文出版社，1995）。

遗憾的是，因为版权关系，有些书不能如愿编入本丛书。如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开山之作孙常叙的《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

本丛书的作者老少年龄相差43岁，有国学渊博的宿将，也有中坚和新星。出版时间先后相差46年，内容有开垦探索的讲话，承前启后的概论，别树一帜的描写，朴实创新的分析，思辨独特的新论，务实严谨的史论。总之，有传统的平实，现代的新潮，当代的前卫。

本丛书是现代汉语词汇学的轨迹史册，是语义学的一条源水，是信息处理的一块基石，是语文辞书的一支血管。一个语文辞书出版单位的信誉，是跟其出版物的学术含量成正比的。

本丛书反映着词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这个转化有三个背景：哲学的现代化转向，其号炮发自 19 世纪末；语言学现代化转向，其号角吹起自 20 世纪初；语义学现代化转向，其启明星升起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一个欧美人不太注意的领域——词汇学，其现代化转向的信号，到了 20 世纪 70—80 年代才从莫斯科学派传出。至今，现代词汇学已经比较明显地带上了四个特色：

（一）现代哲学特色。西方近一百年来现代哲学的主流是语言哲学或分析哲学，其关于语言要素、意义、结构、类型、功能、实在、意识、真理、演绎法、分析法、定量分析、整体论（跟原子论相对）、多元论（跟一元论相对）等哲学思想正在启迪词汇学的新智慧。

（二）现代语言学特色。受现代语言学影响，词汇学形成了双轨模式：一条是继续沿着前期轨道前进，诸如语言系统论、价值观、语言言语二分说、共时历时双坐标思想、聚合组合（静动）双向原则；另一条是沿着后期轨道前进，诸如从一元到多元（指研究单位）、从自治式的微观到非自治式的宏观（跟多学科和外语因素结合）、从单语的个性到多语的共性、从单层面到多层面（语音、语义、语法、语用及其内部各层面）、从描写和理论到解释和应用。

（三）现代语义学特色。现代词汇学正在成功地吸收着现代语义学的一些成果。诸如语义场理论、义素分析法、义位的多元多层次语义特征、义位之间的关系：同义、反义、多义、（同音）异义（以上为传统的四种），上下义（蕴涵、层次）、总分义（总体及部分，即拥有关系）、类义（并列、互补）、交叉、序列、义族（派生、构词）、依存、比例、组合（以上为现代的九种），转换、同义派生、题元、场所、工具、方式、声响、指小、指大、特征、良好、不好、进程、开始、停止、使出现、使不存在、实现、使实现、使就绪、变坏、侵害、表现、处置、来源（或指向）、完成、单位等等（以上为当代七十多种词汇函数）。

现代词汇学也正在尝试吸收语用学成果。如义位的语境动态真值、义位的语境变体、义位的语境特征等。

(四) 数理特色。受数学、计算机科学、信息论、控制论的影响,特别是受数理语言学的直接影响,现代词汇学必然具有四个数理特色:计量特色,形式特色(数学模型、公式、结构式、形式符号、图表),计算机特色(巨型语料库以及由此导出的词汇词义各种定量分析),模糊特色(模糊义研究,由此促进计算机模糊程序的设计以及模糊计算机的研制)。

词汇学,尤其是汉语词汇学,其路漫漫而修远,必将上下中外而求索。愿同道用志不分,共襄盛举。本丛书是蓄水引龙的海湾,现代理论词汇学跃出龙门已经指日可待。

这套丛书的出版,是由苏新春教授提议的,并做了一些发起和联络工作。外研社汉语部的编辑们的敬业精神十分感人,他们确有成效地进行规划、组稿、审编,用辛勤劳动构筑一座座文化景观。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有识之士的引导下,以雄厚的学术为基石,以现代的理论为基础,建构一座举世瞩目的经籍珍品大厦,计日程功。

奉序为贺。

张志毅

2005年7月2日

卜居地芝罘

目 录

词汇理论研究

论词汇体系问题	(1)
论词的单位的确定	(21)
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	
——兼论语法学、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	(42)
词语的形象色彩及其功能	(54)
词目的确定和词汇的范围	(63)
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	(85)
词的同义关系和词性	
——兼谈汉语同义词词典处理词性的问题	(109)
论反义聚合的条件和范围	(119)
词语对比的聚合及其与反义聚合的比较	(144)
就汉语词汇看克鲁斯关于词汇组织的观点	(160)

现代汉语词汇共时研究

对准词汇的重要方面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取向刍议	(176)
词的结构层次分析	(185)
略谈现代汉语同义词的特点	(194)
汉语反义词语的类别和特点	(203)
固定语及其类别	(212)

习用语辞典与成语惯用语问题	(233)
从词汇规范化看方言词的吸收	(247)
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标准问题	(252)

汉语壮傣语词汇历史比较研究

粤语壮语关系词的分类问题及类别例释	(259)
汉语与壮语同源的和搬借的亲属称谓	(282)
汉语傣语同源的基本动作词	(292)
跋	(320)

词汇理论研究



论词汇体系问题*

对具体语言词汇作体系分析的困难，是众所公认的。然而“词汇体系”这一术语已被广泛采用。迄今为止，尽管不少语言学家确认词汇体系的存在，却没有人揭示出一种具体语言词汇的体系面貌。词汇体系的概念一直是模糊不清的。词汇到底是不是一种体系，本文试图以现代汉语词汇为主要的观察对象，对这个问题作一些探索。

一

黄景欣同志在《中国语文》1961年3月号发表的《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谈到了概括出词汇体系构成规律的困难。在这段论说之后，他又说：“但是尽管如此，仍然应该承认分析词汇体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为语言的体系性这一特征已为大家所公认，而这一特征必然也体现在语言的词汇这一构成要素上面。”^①（19页）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

* 此文原发表于《中国语文》1964年第3期。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后录入《词汇学与词典学问题研究》中时，删去了副标题，改动了行文个别地方，补加上两个注脚。作者按：“词汇还不能说是体系”的结论虽完全过时（1990年出版的拙著《汉语描写词汇学》已对此结论作了更改，并有充分的论证、说明），但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探索问题的途径仍然合理。另外，此文是40年前作者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其中一些观点内容和方法经验，成了日后研究的基础或参考点。因此，有录到新选集中的意义。

体系内部的构成要素未必因为处于一个体系之内而本身也是一个体系；这当中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同样，语言体系的存在也不能保证词汇体系的存在。语言具有体系性，显然不是在逻辑上必须以词汇具有体系性为前提。语言体系观念的确立，本是把语音体系和语法体系综合起来的结果。词汇是否构成体系，对于语言体系的存在实际上不起决定作用。只是词汇的全部构成单位在语法的支配下成为构造语句的现实材料，并且能够按语法特征来分类；而语音体系的存在既使词汇和语法中的各个单位具有一定声音形式的物质区别标志，又使语法得以支配词汇。因此，正是由于语法体系和语音体系的作用，词汇能够和语法、语音紧密联系起来而共同构成语言体系。这种事实，不能误认为就是词汇本身有体系性的根据。

黄景欣同志虽然指出分析词汇体系性的困难，却又描写出了词汇体系的一般结构。按照他的说法，“词汇体系是由许多相互对立，互相制约的单位，按一定的词汇—语法范畴逐层逐层地建立起来的”（19页）。最高一层互相对立的单位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等“几个最大词类”；这些词类根据一定的词汇—语法意义标准，又可各分成几个更小的对立单位；“这样逐层地分析下去，直到不能再分析为几个对立单位的那些词，就是词汇体系的最下的一个词汇层”（19页）。看来，实词词类是这个体系结构的基本骨架。把实词词类列在词汇—语法范畴是否妥当，可以不论；但是所有的词类都是词的语法类别，词类的划分问题属于语法学研究范围，这是事实。把支配词汇的语法因素当作词汇本身体系结构的经纬，以为这就解决了确立词汇体系结构的问题，是很值得商榷的。

词汇按其本质来说，是语言建筑材料单位的总和。探讨词汇的体系性，理应考察语言建筑材料单位之间、材料单位自身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的联系。离开组成词汇的单位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本身性质，拿支配它们的语法特点来建立一种体系结构，这样得出来的就只能是语法的词汇组织层次，而不是词汇本身的组织层次。当然，研究词汇应当适当地联系与之互相作用的语法（例如需要研究现代汉语名词不同于动词的构词特点），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探寻词汇的

体系可以拿语法分析来越俎代庖。

几个最大词类作为所谓最高词汇层的词汇单位，词类之间除了有词在词语组合上的结构关系之外，不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关系。如现代汉语，“名词+动词”是主谓关系，“动词+名词”是支配关系，“名词+‘的’+动词”是修饰关系。这种语法关系无论如何不能看作词汇本身的内部联系。然而黄景欣同志却一再申明，各最大词类的最高词汇层及其下的词汇层是按“词汇—语法意义”的标准建立的。这就等于说，词类及其下各层的小类都是在“词汇—语法意义”上的对立单位。显然这并不符合词类的实际情况。既然最大词类之间没有词汇性质的关联，以最大词类的对立为基本骨架的整个词汇层级结构，便很难成其为真正词汇本身的体系性的表现。

其实，单从逻辑上看，按词汇加语法的标准只是求得词汇层、词汇单位和词汇体系，这已是调和不了的矛盾。语言组成要素只能按单一的标准——自身组织特点来建立体系。语音体系是按音位的区别特征及音位组合的情况而建立起来的，语法体系是按语法成分间的对立关系和结合关系而建立的。同样，词汇如果存在着体系，它也只能建立在词汇本身的组织特点上。

“词汇—语法意义”标准还有一个破绽。构成词汇的单位除了词之外，还有词的各种固定组合体，这是大家承认的。黄景欣同志也特别指出，“它们在词汇体系中经常也像词一样，作为一个词汇单位出现，因此决不能排除在词汇之外”（18页）。可是构成“词汇体系”的最高词汇层（即“几个最大词类”）并没有把这些词的各种固定组合体包括进去。其实，这也是办不到的。可见，想借词类的对立来解决词汇体系的建立问题，是有困难的。

二

黄景欣同志断定，“词汇也是一个由许许多多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要素构成的完整体系”（18页），而“在每一个词汇层中，各个词汇单位，各个词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对立的”（20页）。证明这一

论断，只是依据如下几点：

（一）把不同语言一定数量的词总合起来，不能构成词汇，因为它们相互没有对立制约关系；

（二）汉语每个人称代词在与其他人称代词的对立制约关系中获得意义和功能；

（三）在不同语言的词汇中，很难找到意义和功能绝对相等的词；

（四）具体语言指称光谱各种颜色的词，其意义和功能为各词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

不同语言一定数量的词不能凑合成词汇，并不能反证组成具体语言词汇的词相互间有对立制约关系。因为许多词能否组成为词汇，未必取决于它们是否相互对立制约。

现代汉语人称代词之间首先含有一些语法对立的成分。如“我”与“我们”，“你”与“你们”，“他”与“他们”，都表明单数与复数的对立。至于“我、你、他”之间及“我们、你们、他们”之间，可以认为存在词汇范围内的对立关系，因为把这些词的一定的人称意义看作词汇意义似乎比看作语法意义更合适，而第一、第二、第三人称的意义在这里却是互为条件而又互相排斥的。但是不论怎样，现代汉语人称代词的这类对立并不表明其他类的词都有同样的对立关系。例如“血”、“油”、“锚”、“井”、“树”、“人”、“球”、“纸”、“笔”等许多名词，“踢”、“指”、“舀”、“射”、“蹲”、“翘”、“流”、“泼”、“溅”、“病”等许多动词，都找不到与自己有这类对立的单位。

在两种语言中，意义和功能绝对相同的词是不多的。然而意义的不同，并不都说明相应的词在两种语言里各处于不同的制约关系之内。英语的 *uncle* 可以指父母的弟兄或父母的姐夫、妹夫，但并不等于汉语的“叔父”；*uncle* 只与 *aunt*（指父母的姐妹或父母的嫂嫂）相互对立，“叔父”却既与“伯父”相对立，又与“婶娘”相对立。这是意义的不同恰好与词所处关系的不同相关联。与此相反，英语的 *philosopher* 和 *apartment* 在意义上不等于汉语的“哲学家”和“房子”。因为 *philosopher* 可以指哲学家或贤士，*apartment* 可以指房子或公寓；但是 *philosopher* 与“哲学家”、*apartment* 与“房子”都并不

因此而必然处在互不相同的词语制约环境里。可见，在两种语言里难于找到意义绝对相同的词这点，还不足以说明不同语言的词必然处于不同的制约联系之中。至于词的功能，既然从词汇的角度来看问题，它就不该指语法功能，而应当指词能与什么具体的词在连用中相搭配。可是语言全部词的搭配情况如何表明使词汇成为体系的对立制约，这是不清楚的。问题在于，词的功能能否不表现为词语自由组合的言语现象，言语的组合又可不可以看作语言词汇的内部联系，这都还有待研究解决。因此，词的功能与词的对立制约如何相关联的问题，根本还不明确。在这种情形之下，以“很难找到功能相同的词”来证明“词汇单位”都相互对立制约，显然是无力的。

格里逊 (H. A. Gleason) 把 purple (紫)、blue (蓝)、green (绿)、yellow (黄)、orange (橙)、red (红) 这一组词看作英语表明光谱各种颜色的一种内容结构和表达结构。这是在与 Shona 语和 Bassa 语的对比中显示出来的：这两种语言只分别以三个词和两个词来指称同样光谱的颜色。^②黄景欣同志据此来说明，“每一个词在语言中的意义和功能只有在和所有其他词汇单位构成的体系中才能确定下来” (20 页)。格里逊关于 purple、blue 等词的说法可能有道理。但是不能由此推论，词汇的构成单位 (即一般所说的词汇单位) 全都处在这类内容结构和表达结构里。

在两种语言体系中，确实可以看到那样的词汇单位组，它们各单位所体现的概念 (即其理知意义) 都是同一客观对象不同组成部分的个别反映，但是在含有多少单位来分割这一客观对象上，以及在各单位所示概念的外延上，却各不相同。例如北京方言拿“公鸡、母鸡、小鸡”三个名称来区别性别、大小不同的鸡，广州方言却有六个名称把这同样的对象在类似方面区别开来：“鸡公”指雄性而长大的鸡，“鸡公仔”指雄性、未长大而只会短短啼一两声的鸡，“鸡乸”指雌性、已成熟并且下蛋的鸡，“鸡巷”指雌性接近成熟而未下蛋的鸡，“骗鸡”指已去势而仿佛是中性的鸡，“鸡仔”指啁啾而鸣的鸡。这里，“公鸡”和“鸡公”，“母鸡”和“鸡乸”，“小鸡”和“鸡仔”，由于各自处在“分割对象”的不同系列里，体现着外延不同的

概念，在意义上是不相等的。很清楚，在鸡名称的两个系列里，每个词汇单位在意义范围上都受其余单位的制约，彼此互为条件而又相互排斥。这样的系列当然应该确定为对立联系的组织结构，可称之为“分割对象组”。像“我、你、他”，“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高中”与“初中”、“高小”与“初小”、“乔木”与“灌木”、“草本”与“木本”等等，就都各是个“分割对象组”。英语划分光谱的一组词之间，正是存在着这类组织结构的对立制约关系。具体语言或方言的词汇中存在哪些分割对象组，是应当研究的问题。但是不能指望这种研究本身能建立起词汇体系，因为不是所有词汇单位都落入分割对象组中。上面提过，“血”、“油”、“锚”、“井”、“踢”、“指”、“舀”、“射”等许多名词、动词就没有在意义上和自己互为条件的对立单位。不少的形容词也如此，如“沉闷”、“渺茫”、“矫健”、“婀娜”、“飘逸”、“孤僻”、“晶莹”等等。词的固定组合体（如成语）更是很少处在分割对象组中。这些词汇单位，其意义不是由分割对象而反映其一部分所得出的，因此尽管这样的单位也可与其他词汇单位在所体现的概念上统属于一个上位概念，但是不可能认为彼此就因之而互为条件地对立制约。如“血”与“水、油”所指的对象可以概括为液体，“孤僻”与“和婉、暴躁”也可以统属于性情的概念，但是“血”的意义很难说成与“水、油”有关，“孤僻”的意义自然也不可能与“和婉、暴躁”的意义相互制约。黄景欣同志似乎没有看出这类名称的统集与分割对象组的重大差别，以致拿表示光谱颜色的一组词来推断所有词汇单位都处于对立联系的结构。自然，这样的推断是站不住脚的。

以上的分析表明，认为词汇所有构成单位都处于相互对立制约中的看法并没有可靠的根据。依凭这种对立制约而作出的词汇是一种体系的论断，自然很难是正确可信的。

黄景欣同志援引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世界一切事物都相互矛盾和联系的原理，也并不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是指一般事物整体而言，而不是指体系。体系固然也有内部的矛盾联系，问题在于它们在性质特点上，是否就与非体系中的内部矛盾联系完全一